

张 沪 编

张宗麟
乡村教育论集

许德珩题



张宗麟乡村教育论集

张 沪 编

湖 南 教 育 出 版 社

一九八七年

张宗麟乡村教育论集

张 沪 编

责任编辑：张 哲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展览馆路3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
字数：460,000 印张：20.375 印数：1—300

ISBN 7—5355—101—X—/G · 102

统一书号：7284 · 860 定价：5.55元

有关教育改革的几点参考意见

——代 序

刘季平

张宗麟同志是我的老师，我们向来都习惯于称呼他张先生。张先生这本《乡村教育论集》，着重论述了他过去协助陶行知先生试办乡村教育工作的实际体会。

六十来年以前，陶行知先生为配合当时政治上的国民革命，决心从乡村教育入手，探索教育革新门路。为此，在经过一段酝酿与准备以后，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在南京郊区开办了一所新型学校——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这所学校虽然在一九三〇年四月即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封闭，可是它的影响和种子已经散布到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纷纷响应陶先生的号召，陆续发展了一些乡村学校。当然，乡村教育还只是陶先生开始提倡生活教育的新起点，和他在其后十多年内进一步适应中国革命历史任务的发展而提倡抗日救国的国难教育及其后的民主教育等等相比，只能说是初步尝试。但就其主要之点而言，已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揭示了崭新的一页。

那时张先生曾任晓庄师范学校生活指导部主任（相当于教导主任），协助陶先生具体掌管全校日常教学生活和各项活动。后来又在厦门集美、山东邹平和广西、湖北等地，为推行乡村教育继续做了很多工作。他这一本书，就是这一时期所经历的许多重要

情况的总结。

我是在一九二八年春季转学到晓庄师范学校以后，开始认识陶先生、张先生和其他一些老师、同学的。当时我对陶先生的生活教育学说还不大理解，但一去就感到这个学校和一般学校大不一样，就对陶先生、张先生等老师产生了既很敬佩、又十分亲切的印象。现在再回顾过去的所见所闻，更深深觉得，张先生所反映的他和陶先生的教育思想与道德品质，不仅没有由于时过境迁而失去光泽，还对当前我们贯彻执行中央指示、搞好教育的实际工作有不少可供借鉴、学习的现实意义。其中和今天关系较大、特别值得重视的，似有以下几点：

关于教育工作的战略地位问题。我觉得他和陶先生都十分重视教育在整个社会改造与建设中的战略地位。这种思想认识是很值得我们好多同志借鉴的。陶先生很早就认为教育与政治不可分离，他在一九二五年谈到内蒙教育时就说：“内蒙革命与内蒙教育同时并进，方能解除蒙民之倒悬。”一九二七年他在欢迎南京市教育局长和各学校校长到晓庄参观时，更针对全国需要指出：“既有国民政治上的革命，同时还须有教育上的革命，……二者同时并进，同时革新，国民革命才有基础和成功的希望。”他着重搞乡村教育，正是出于这一基本认识，只是由于乡村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才决心集中精力先从这里入手来做工作。张先生很快摆脱其它工作，专心一意来参加乡村教育工作，也只有树立了这一思想才能办到。这种思想和现在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指示精神，和把教育改革看成与经济、科技改革和建设密切不可分的重大战略环节的指导思想，显然是有共通点的。可是这个问题在当前我国有些同志的思想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求得彻底解决。例如：有的同志一直不重视教育，不关心如何

提高全民族在德智体诸方面的整个素质；有的同志只为解决他本部门眼前所需人才，或为有利于其子女升学，而重视少数重点中、小学和高等学校，不考虑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需要与长远利益，不关心广大青少年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有的同志口头上承认教育工作重要，实际上却瞧不起教育工作，不愿其子女进师范院校，做教育工作。这些认识问题不抓紧解决好，必然要直接影响到政治、经济 and 科技的发展，影响到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局。因此，我觉得，除认真学习并贯彻执行中央、国务院的有关决定与政策措施外，还有必要重视张先生这样的书，使更多同志能够从中得到应有的启发。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迫切问题。目前我国教育工作方面，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切实搞好教育改革。小平同志早就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中共中央在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又于去年五月进而作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一面强调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一面强调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一面要改革管理体制，调整教育结构，一面要求改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又在今春进而作出逐步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决定；各地、各有关方面对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师范教育等等，也做了不少工作，有了不少进步。但是，应该承认，至今仍有一些同志，正如对教育工作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一样，对教育改革的迫切需要也往往缺乏应有的认识。例如，现在还有人不能面向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针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需要办教育，而只满足于传授灌输已往国内外死的书本知识；有人对千千万万人争过“独木桥”，片面追求升学率，偏重重点学校，以及由此引

起的种种恶果，似仍不大重视；对绝大多数青少年儿童在政治思想、科学文化、职业技术、健康体魄和道德法纪等方面的全面教育也多注意不够。

对于上述这样一些同志，我觉得认真看看陶先生、张先生的言论、行动，可能会有一些好处。陶先生早在那次国民革命正进入高潮的一九二六年，就发表《宣言书》，要以改造乡村为目标来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并且下决心要“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接着又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公开发出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的招生广告，宣布三大“培养目标”：（一）农夫的身手；（二）科学的头脑；（三）改造社会的精神。不仅如此，他还说到做到，亲自带头赤脚下乡，和全校师生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一起实干。张先生在那里，也一直是同样抱着改造教育，提高乡村的觉悟，以决心和实干精神做人行事的。他们之所以能如此，主要就是因为他们不仅有通过教育来配合政治革命、改造五千年古国的爱国思想与远大理想，还有一颗走生活教育门路认真革新教育的坚强决心，坚决反对一味教死书的旧传统教育和一味“拉东洋车”的洋化教育，坚决相信行是知之始，相信社会实践生活是最重要的教育，整个社会是最重要的学校，教学都要以做为中心。因而只有积极参加改造社会的实践生活，注意在劳力上劳心，才是为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服务的新教育的基本途径；只应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实践生活的需要，择要学习古今中外的有用知识，并灵活运用于新的社会实践，才能不断创新，不断前进。

当然，他们过去办乡村教育的某些具体要求与做法，今天我们已不能完全照抄照搬。但是他们早就具有这样鲜明的革新旧教育的思想与干劲，却是很值得我们好好深思和借鉴的。

关于抬头乐干的献身精神问题。我觉得张先生这本书还非常朴素地反映了陶先生和好些有关同志的高尚品德。即下定决心、全心全意为革新旧教育、建设新教育而奋斗的献身精神。他们为挽救贫穷、落后、受尽封建压迫、列强欺凌的五千年古国，为谋求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宁愿放弃原先在大城市中比较舒适的生活，完全不计较个人得失，自觉自愿跑到荒山穷乡去，从自己开荒、种地、造林、建造茅舍……等等入手，来试办以改造旧乡村为目的的新乡村教育。而且不管碰到多大困难、阻力与压迫，都百折不挠，再接再厉地坚持下去；甚至还能自得其乐，朝气蓬勃地抬头乐干到底。

这种献身精神，在当时固然非常难能可贵；在今天，也完全可以媲美于好些新的英雄模范人物。我觉得，目前在我国教育战线上，发扬光大这种献身精神，确实是需要引起重视的一大问题。因为现在这种精神虽然已比十年动乱中的情况大有好转，却依然很不足，依然有不少人不愿学师范，干教育，特别是不够重视教育改革。这里的原因很多，解决办法也要靠多方努力，如进一步提倡尊师重教，更好地设法改善物质条件，改善教师生活，等等。但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条，仍然还是要以新老典范为榜样，大力发挥广大教育工作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以及自觉抓紧教育改革的献身精神。因此，我认为张先生这本书，也是值得我们很多同志参考的一本有益的书。

近来我因病未能细读张先生这本书的全文，对当前情况也未能深入调查，只能对照过去和现在的若干粗浅印象，略述上面几点看法，聊供读者参考。如有不当，请批评指正。

一九八六年六月

回忆张宗麟校长 在邹平县立简易乡师的事迹

原邹平县立简易乡师学生 王景五 宋一平

张宗麟校长是三十年代中国知名的教育家，著有《幼稚教育》和《乡村教育经验谈》等书。一九三五年九月应聘到山东省邹平县立简易乡村师范任校长，以他为首聘集来一批进步教师。他们以陶行知先生提出的“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为理论根据，“教学做合一”为指导，以晓庄师范为榜样，按上海山海工学团的办学方针，在邹平简师内积极提倡“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主张“在劳力上治心”，还提倡“小先生制”，“发展民众教育”。特别是“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后，在中国共产党影响和帮助下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在实际斗争中认识到教育应为民族民主革命服务的重要性，他大胆地采取了一系列革命措施，在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在两班学生中播下了革命抗日的火种，为以后民族民主革命和新中国的建设培养了一部分干部的幼苗。现将我们能回忆起来的一些事迹简述如下：

一、师生动手，改造校园。邹平简易乡村师范的校址是在那时县城南门里路东古文庙内。前边是大成殿和东西两廊，和东廊东面的两处小院，还有几株古柏；后边过去曾是职业学校，有北面西面两排宿舍和一座教室，还有两处小院。张校长动员师生改

造校园时曾说，我们要拆除这些断墙残壁，把它改造成花园式的校园。我们还要拆除师生之间、男女同学之间那些封建残余意识的“墙”，实行男女合校，大家团结和谐共同进步。大会动员后，接着发动师生整修了两廊做教室，拆除了小院的墙，修建了操场的围墙，建造了一个大讲台，在校门内利用旧影壁建了一处办公室。满院广植树木花草，把学校改造成了花园似的，一扫过去的古刹气氛。

二、改革教学，建立实习园地。在张校长到任前，学校的教学方法是先生讲，学生听。张校长到任不久，即在二年级实行了“道尔顿制”，主要方法是讨论式的。教室内除教桌外设了四张长方形课桌，学生分四组围坐，各科任课教师事先把要学习的内容告诉学生，学生经过自学提出问题，然后教师作总结式的讲解，再布置必要的作业。这样就避免了填鸭式的教学，发挥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也便于互教互学。师范要有学生及时实习的地方，因此征得当时地方政府教育部门的同意，将原邹平县立高级小学改为实验小学，实行男女合校，原女子小学改为幼儿园，以便师范学生随时可以由教师带领去实习。记得当时的幼稚教育家戴自俺先生带领北京香山幼儿师范的一班学生来邹平简师参观教学。戴是那时香山幼儿师范的校长，是张宗麟校长的学生。在这里参观教学，参加活动，听取报告，住了两三周的时间。

三、开辟阅览室，订阅进步报刊。在张校长到来之前，学校没有阅览室，更没有进步报刊。张校长来后在师生改造校园的同时，利用大成殿辟为阅览室，订有《大众生活》、《大众哲学》、《铁流》、《社会科学》、《世界知识》、《中日力量对比》、《中国农村》等进步刊物。还有《大公报》、《中央日报》、《邹平实验县报》等。同学们在课外时间阅读报刊，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在此基础上，

张校长组织学生自办壁报，由语文老师直接帮助。二年级的壁报名称是《野火》，一年级是《萌芽》。

四、建立课外活动小组，大唱革命歌曲。课外建立了木工组、戏曲组、音乐组、艺术组等。音乐教师邹德馨教唱“开路先锋”、“大路歌”、“渔光曲”、“打回老家去”、“毕业歌”、“满江红”等。张校长还亲自教唱“锄头舞”、“凤阳花鼓”。这些歌，同学们唱起来歌声嘹亮，情绪激昂。它有力地激发着人们的斗争向上精神。那时在校园，在回家的路上，随处都可听到同学们的这些歌声。时隔四十多年，似乎今天还萦绕在耳边，这些熟悉的歌声，深刻地留在同学们的脑海中，唱起歌来就回想起张校长教唱时的激情。在课余时，老师领导同学排演了话剧“放下你的鞭子”。后来潘一尘老师还领导同学排演了大型话剧“雷雨”，演出后在邹平轰动一时。

五、实行小先生制，办灾民教育。一九三五年，暑假开学后，张校长组织一部分同学去办午学。办法是在附近农村选一处适当的地方，在中午饭后，由教者想办法召集失学的男女儿童或青年，教他们唱歌识字。记得我们被分配在南关村，第一次去时，我们选择了大街路西一棵大槐树下，有几位男女小孩好奇地围到我们跟前。我们和蔼地同他们攀谈起来，说明我们是城里师范学校的学生，以后要常到这里来教你们唱歌识字，请他们告诉那些没上学的每天中午饭后可到这棵槐树下学习，接着我们就唱歌、讲故事给他们听。就这样，一直坚持到秋天。

那年秋天，鲁西南曹州菏泽一带黄河决口，许多灾民流离失所，那时山东省当局把这些灾民分配到铁路沿线各县暂居。分到邹平县的灾民，县当局便把他们分到县城南关、北关和黄山的庙里住。张校长就组织我们一部分同学去教那些失学的儿童。记得那次，我们也是被分配到南关。第一次去是张校长领我们去的。

到了那里，他先给灾民和孩子们作了简短的讲话，以后我就教孩子们唱歌识字，教了几次，后来可能是水已退去，灾民们就走了。我感到这样做，不仅对当时的社会教育起了作用，并培养了师范生的教育思想和教学能力。

六、露营旅行，在活动中学习。一九三五年秋，张校长支持一部分高年级师生组织露营旅行。他们带了帐篷到各乡乡学所在地旅行，晚间就住在帐篷里。同学们学着象军队一样轮流站岗放哨，白天就分组作宣传，向群众讲演，教唱歌曲，并作调查活动。有的调查农民生产生活情况，有的调查学龄儿童就学情况，有的在野外由生物老师朱抱坚带领采集标本。晚间还组织点篝火（在旷野）等娱乐活动。他们旅行了全邹平县的十三个乡。最后到第三乡时，张校长组织简师和实验小学的全体师生到当时的第三乡三官庙迎接他们，全校师生一同返校。

七、一九三五年“一二·九”“一二·一六”后，学校内的情况。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进而窥视华北，妄图吞并我全中国。一九三五年冬，汉奸李守信组织热察防共自治，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汉奸企图进一步搞华北自治。在危急形势下，一九三五年“一二·九”“一二·一六”先后爆发学生爱国运动，很快抗日救亡运动席卷全国。这时张校长与全体进步师生酝酿、组织抗日救亡队下厂下乡作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师生在壁报上纷纷撰写文章大声疾呼抗日救国，誓死不作亡国奴！那时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梁漱溟先生曾有一次谈话说：“当前的中国有三条路，一条是蒋介石国民党的路；二条是毛泽东先生在延安领导的共产党的路；第三条是乡村建设的路。”这次讲话后引起了纷纷议论。刘殿邦同学在《野火》报头上画了一幅很醒目的画，画面上有三条路，左边一条是布满荆棘的陷阱的路；

右边一条是弯弯曲曲的小路；中间一条是通向延安的光明大道，为首的一名男青年学生昂首阔步踏在中间的大路上。这幅画引起了全校师生的注意和评论。无疑，这是张校长针对梁漱溟先生的讲话、指导学生作出来的。差不多同时，张校长满腔热情地教育我们学生怎样观察人，怎样做人，怎样不做亡国奴。有一次谈话的题目是“谈谈人的眼睛”。张校长说：“今天我对大家谈谈人的眼睛。人的眼睛看事物有三种：一种人的眼睛是佛眼，佛眼人把天地间的人和事都看成是好的、善的、美的，在他们眼里天地间没有坏人坏事；另一种人的眼睛是鬼眼，这种人把天地间的人和事都看成是坏的、丑的、恶的，在他们的眼里，天地间没有好人好事；以上两种人的眼睛看人和事都不对。第三种人的眼睛是科学眼，我们要有这种眼睛，用这种眼睛看问题就是用科学分析的方法去看世界，看问题……”现在我们体会这是张校长用比喻的方法讲革命的道理，即必须用革命的人民立场去看问题，让我们学生分清抗日人民与汉奸走狗，分清敌友。那时邹平县教育界同全国各地一样，存在着抗日救亡和拥蒋卖国两种势力的激烈斗争。以张校长为代表的教师、学生等主张抗日救国的人们都团结在张宗麟校长的周围；以徐树人、黄良庸为首的则积极宣传蒋介石的“攘外必定安内”的反动政策。张校长经常讲“兄弟鬩于墙而外御其侮”的“安内必先攘外”的道理。双方斗争日益加剧。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大军入侵华北，“何梅协定”出笼了。日本人指使汉奸殷汝耕在通州建立傀儡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一事件，马上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在这种情况下，全校师生群情激昂，马上采取行动，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出发前，在操场开大会，大家慷慨陈词，反对“何梅协定”，反对国民党反共反人民，对日妥协投降，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

日。最后通过永远下半旗，致电南京政府……

简师师生与群众抗日斗争的进一步高涨，县长徐树人和研究院秘书黄昆庸都被吓破了胆，他们便密谋策划对简师这一革命教育阵地发动了进攻。他们扬言简易师范“赤化”了，要赶走校长张宗麟，封闭学校。他们这种阴谋活动自然激起了广大革命人民的义愤。简易师范的学生一马当先，举行了罢课，抗议县和研究院当局的倒行逆施，坚决主张张宗麟校长继续主持简师工作。同学们组织纠察队站岗放哨，昼夜巡逻，维护学校秩序，警惕对方捣乱破坏学校秩序。徐树人等软硬兼施，几次派来说客，都被同学们轰了出去，于是徐树人派出大批武装警察包围了简易师范，并准备逮捕革命教师和带头的学生。邹平县和研究院反动当局这一罪恶行径，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反动本质。当时简师的罢课在继续着，师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爱国人士的好评，得到了外面进步人士对学校师生的支援。这是对当时反动当局者一次沉重的打击。但是，他们依仗蒋家王朝和韩复榘等实力人物的撑腰，在遭到打击后，他们的反动气焰还是非常嚣张，对革命师生进行了更加疯狂的反扑。他们放出空气说要抓人，动员了县里的武装警察，准备动武，眼看事态就要扩大。在这紧要关头，如果一味硬拚下去，就上了他们的圈套，给革命造成损失。经过进步师生的反复酝酿，经过张校长在同学们中解释说服，为了更好地从长计议，采取策略的斗争方法，才使形势暂时缓和下来，但斗争仍在继续。

八、愤然离去，辗转奔赴延安。一九三六年初春的一天，警察包围了学校，如临大敌。这时，我们看到张校长在屋内忙着整理行李，旁边站着一个警察。一会儿，同学们集合队伍冲出校门，去研究院找梁院长请愿。后来同学们得到的答复是：他很难堪，作不了主。同学们回校后，队伍站在校长室门外，这时张校长出

来站在同学们面前，还没有讲话，同学们都禁不住失声哭了。张校长两眼发光，嘴唇颤动，说道：“同学们！不要哭！哭是弱者的表现，哭是没有用的！世界上没有平坦大道可走，道路是曲折的。今后你们要团结起来，努力学习，奋斗下去，前途是光明的！”接着，张校长与两班同学一一亲切握手告别，在全体同学含泪护送下上了汽车。校门前面、街道两旁站满了人群，在武装警察的监视包围下，大家慷慨激昂，喊口号，演说，一致表示要团结起来斗争到底。同学们并派了八名代表送张老师到周村火车站。到周村车站后，张校长和八位同学再次一一亲切握手告别，而对站在一旁代表研究院“欢送”他的黄良庸却一眼不睬。张校长就这样愤然离开邹平。后来，听说他到上海后过了一个时期，就辗转奔赴了延安。

事实说明，张宗麟校长在旧中国时是一位爱国教育家。在教育上他大胆改革、实验、创新、探索，力求教育为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服务；当国家民族危急时，他坚决支持、领导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他坚持真理，主张正义，不顾个人得失，与反动势力作斗争。他那和蔼可亲而又严肃认真的师长态度，他那热爱教育事业为国为民和无私的高尚品德，令人十分崇敬，他那高大的形象，将永远铭记在学生们的心中。当我们写这篇回忆时，更加怀念我们的校长张宗麟老师。

出版者的话

本书是本社已出版的《张宗麟幼儿教育论集》的姊妹篇，收录了作者有关乡村教育的著作和论文凡十一种（篇）。

张宗麟同志从一九二七年起，就追随陶行知先生献身乡村教育事业。陶先生教育思想的主要方面，就是致力于普及乡村教育，以期提高我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他曾经立下“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设一百万所乡村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的宏愿，认为发展乡村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大计”。对乡村教师，他提倡要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对乡村学生，他提出要培养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本领，主张教育与生产劳动，与社会生活结合起来；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以教人者教己”等一系列“生活教育”的理论，张宗麟同志对陶先生这些主张身体力行，不遗余力，本书可以说就是他的实践总结。因而成为本社出版的《陶行知全集》的重要辅助研究资料之一，彼此配合，相得益彰。

从这本书中，读者可以对陶先生的教育思想得到实践的印证，增强感性认识，这对深入研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无疑是有重要价值的。现在，虽然时代不同了，我国社会和农村情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陶先生的理想正在变成现实。但他们所提出的许多教育原则和方法，在当前普及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中，仍然值得参考和借鉴。

本书有许多文章，采用通信、提问、访问记等形式，文笔清新活泼，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借形象思维以表述严谨的理论体系，别开生面。有些原来附有思考或练习题，由于篇幅关系，均从略，特此附带说明。



1928年夏，张宗麟摄于南京晓庄。